

# 求真何其難

## ——評楊天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三）》

● 王成勉



自從《蔣介石日記》在2006年開放以來，民國史研究產生了一股新的推動力。楊天石不但是第一批使用蔣日記進行研究的學者，後來還三度往返胡佛研究所閱讀這些日記，並出版三輯《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

楊天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三）》（香港：三聯書店，2014）。

自從《蔣介石日記》（以下簡稱蔣日記）在2006年開放以來，民國史研究產生了一股新的推動力，不只在解讀蔣介石個人經歷與內心世界方面獲得重大的研究進展，甚至對於民國歷史上的一些疑案或是大事，也因為這份重要史料的開放而

得以佐證、澄清或辯誣。蔣日記開放已近十年，前往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 (Hoover Institution) 參閱這份史料的學界中人少說也有好幾百位，也不知產生多少著述和專論。閱讀者雖眾，然而能夠精彩解讀進而立論，且為各方折服的著作卻不多見。史學界似乎已渡過了蔣日記開放初期那種紛亂、爭鳴的時期，看來現在需要經過一段沉澱期，才会有宏觀的大部頭著作問世。

在前往胡佛研究所的學者中，參閱蔣日記用時最多，著述最勤者，當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楊天石。早在蔣日記開放以前，楊即在中國大陸與台灣的一些典藏單位閱讀相關抄本，同時對國民政府檔案也用功甚深，已經有很多相關著作問世<sup>①</sup>。而在蔣日記開放後，他即遠赴胡佛研究所，不但是第一批使用蔣日記進行研究的學者，後來還三度往返胡佛研究所閱讀這些日記，可見其用功之深<sup>②</sup>。

楊天石後來將他在各種刊物發表的關於蔣日記解讀的文章結集成冊，分別在中國大陸和香港出版。

由2008年至今，已在香港出版三輯《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sup>③</sup>。2014年出版的《找尋真實的蔣介石》第三輯(引用只註頁碼)與前兩輯形式相近，都是將各式文章彙成一冊。在此書的〈自序〉中，楊天石一開始即自云：「第三輯，收十三篇專題研究論文，三篇書序，一篇演講稿。」(頁IV)這些文章依時間分成四個部分：第一編「抗戰期間」(3篇文章)，第二編「國共談判」(2篇文章)，第三編「戰後中國」(4篇文章)，第四編「退守台灣」(4篇文章)；另有數篇附錄。本文主要從抗日戰爭、運動德國反對力量、國共和談、綜論蔣介石等方面評介該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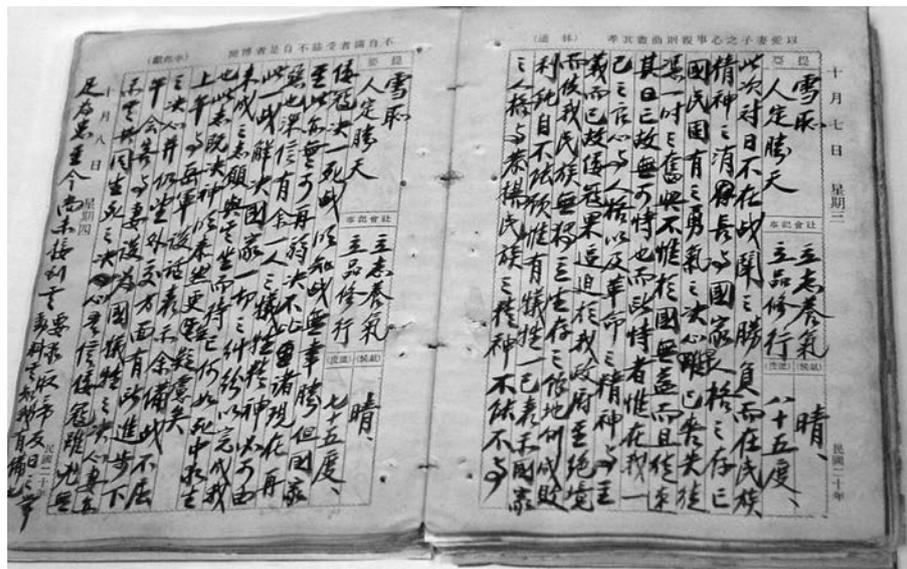
## 一 蔣介石與抗日戰爭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中國大陸學界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一再貶抑國民政府與蔣介石的抗日立場，直到1980年代起才對國民政

府的抗戰有了「正面戰場」的肯定看法<sup>④</sup>。楊天石在他的三本系列集子中，都為蔣介石的抗戰事迹加以澄清：在前兩輯已有數篇文章討論蔣如何領導抗戰，在第三輯則提出在「七七事變」之前，蔣就已經採取強硬的抗日態度與做法。

楊天石以1936年的綏遠抗戰經過為例證，在〈綏遠抗戰與蔣介石對日政策的轉變〉一文中，他根據蔣日記、《事略稿本》、陳誠與閻錫山等檔案，勾勒出蔣介石為綏遠抗日的主導，不但向日本官員強調中國之主權，多次電文催促閻錫山布兵備戰，更派出軍隊易服偽裝成閻的部隊，直接與日軍作戰。這些行動在在展現了蔣對日本侵略所採取的強硬態度。楊認為，蔣過去因為全面對日抗戰的準備不足，對日事務多是謹慎從事，如今兩廣統一、安內有成，故在處理綏遠抗戰的過程中，「維護國家領土與主權完整，堅決抗日的決心和意志已經充分表露，其一貫的民族主義立場也已經充分表露」(頁23)。

楊天石根據蔣日記、《事略稿本》、陳誠與閻錫山等檔案，勾勒出蔣介石為綏遠抗日的主導。在既無外援又受地方軍閥困擾的情況下，蔣面對日本侵略如何居中策應以及忍辱負重，似乎可以運用蔣日記多加着墨。



蔣日記開放已近十年，閱讀者雖眾，然而能夠精彩解讀進而立論，且為各方折服的著作卻不多見。(資料圖片)

楊天石閱讀蔣日記之認真與仔細，從他討論蔣介石運動德國內部反希特勒之經過即可看出。楊發現，蔣在二戰時期曾經企圖聯絡德國內部反希特勒的人士來推翻希特勒政府。

這篇文章雖然對蔣介石抗日的態度、對日本的立場，以及抗日的準備都有敘述，可是對於蔣內心的屈辱及其應付地方勢力的作為，並未有深入討論。閻錫山為地方實力派，對於是否全力抗日，態度一直猶疑，蔣如何與之交往、如何曉以大義、如何誘以實利，是可以再加鋪陳的地方，也更可以突顯當時蔣抗日的為難之處。換句話說，南京政府當時處於弱國外交，在既無外援又受地方軍閥困擾的情況下，蔣面對日本侵略如何居中策應以及忍辱負重，似乎是可以運用蔣日記的記載並多加着墨的地方，但楊天石卻沒有充分討論蔣的心理活動，令人稍感可惜。

類似情節也發生在楊天石討論新疆主權的一篇文章中——只是把日本侵略綏遠換成蘇聯垂涎新疆，而地方實力派軍人則從閻錫山改成盛世才。楊在〈蔣介石收復新疆主權的努力〉一文中，先描述盛世才依靠蘇聯力量獨霸新疆，加入蘇聯共產黨；當蘇聯在新疆一再擴張勢力的情況下，盛世才轉而與國民政府聯繫。蔣介石把握這個機會收服盛世才，將新疆納入掌握，並在1944年調任盛到重慶擔任農林部部長。在這個過程中，蔣拿捏得非常小心，既要拉攏盛世才，又不能示弱；既要抗拒蘇聯的壓力，又不能與蘇聯直接交惡。楊將這段經過敘述得很清楚，讓讀者了解到蔣在收復新疆主權上，「表現了其維護中國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的愛國主義的思想和立場」（頁59）。學界早年對於蔣的外交政策多有批評，認為他過於親美，卻又應付得不得

其法，但是後來持肯定立場的專書陸續出版，楊的研究也可以視為對這種觀點的繼承。

然而，楊天石在該文的結論中卻有一段值得商榷的斷語：「歷史證明，蔣介石對付盛世才一流軍閥游刃有餘，但是，對付蘇聯這樣的大國、強國，就技遜一籌，遠不是其對手了。」（頁90）楊當然知道抗戰期間蔣在進行弱國外交，不但不能與蘇聯衝突，而且還有求於蘇聯在國際上的支持以及其對中共的制衡。在這個背景下，蔣企圖維護國家的主權是很不容易的事。若是楊要突顯蔣應對蘇聯時有所失當，宜直接指出蔣在哪一方面有所不足，或者在某個問題上可以有更好的對策，並舉出具說服力的例子，以資論證。比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與國共內戰期間，蔣介石過於親美拒俄，讓蘇俄愈來愈轉向支持中共，曾有學者撰文解釋其中之故，楊天石似乎未曾注意<sup>⑤</sup>。至於基於蔣日記的研究是否可以總結出他對於俄國與斯大林的態度，楊在這方面似乎着墨較少。

## 二 運動德國內部反希特勒

楊天石閱讀蔣日記之認真與仔細，從他討論蔣介石運動德國內部反希特勒之經過即可看出。由於蔣日記對於某些重要事情記載得相當隱晦，往往僅寫道與誰見面或是有甚麼工作事項，但是與人談話的內容或是工作的具體內容，則多半不會詳細記述，所以要從蔣日記去了

解事情的來龍去脈以及解讀蔣記事的用意，並不容易。楊發現，蔣在二戰時期曾經企圖聯絡德國內部反希特勒的人士來推翻希特勒政府，在蔣日記中較直接的記載僅是「運動德國軍隊倒戈」，另一處則是「派齊俊赴瑞士」（頁29）。

楊天石沿此線索，費了極大的努力查閱國民政府檔案以及宋子文檔案等資料，完成〈蔣介石與德國內部推翻希特勒的地下運動——迄今不為人知的二戰機密之二〉一文並收入第二輯中<sup>⑥</sup>。但是這篇文章的討論過於簡單，主要引述國民政府駐德武官齊俊給蔣的報告，缺少旁證支持，引來學者汪榮祖的質疑<sup>⑦</sup>。楊在第三輯所收的〈蔣介石與德國內部推翻希特勒的地下運動補述〉和兩篇附錄〈蔣介石企圖策動「德國軍隊倒戈」的史實應該得到承認——敬答汪榮祖教授〉、〈憎而應知其善——再答汪榮祖教授〉，即為回應汪的文章。楊從《事略稿本》中再發現了一些資料，證實國民政府的確透過宋子文撥款三萬美元予德國的中間人之事（頁47-48）。此外，他發現齊俊給蔣的報告亦顯示，齊俊所接觸的德方人士包括軍火商克蘭（Hans Klein）、內閣部長沙赫特（Hjalmar Schacht）與國防經濟廳廳長托馬斯（Georg Thomas）（頁42-43）。另外，可以作為旁證的地方，還有楊引述蔣親自向蘇聯駐華大使潘友新透露德國內部反希特勒之事，並要其將此消息轉告斯大林；同時也囑咐蔣夫人在訪美時將此事告知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頁30-31、44-45）。楊透過蔣日記與國民政府的史料，論證

蔣策動德國內部推翻希特勒一事，可說是一個重要的研究發現。

像運動德國內部反希特勒這等絕密外交大事，其間之規劃與中德聯繫，按理應該不可能詳細見於官方記錄或文字，可是，此事若無任何德國方面的資料佐證，似乎也說不過去。例如文中提到至少匯款三萬美元予德國的中間人，更易令人產生諸多疑問：反希特勒人士缺乏數萬美元經費嗎？德方是否收到來自中國的經費？他們對於中國政府有無任何承諾？由於該書沒有任何德國資料的印證，很容易讓人產生懷疑。楊天石若能將他的文章譯成德文或英文，德國的學者與專家或可根據德文相關資料作進一步考證；只要有蛛絲馬迹，此案當可再無爭議。

像運動德國內部反希特勒這等絕密外交大事，其間之規劃與中德聯繫，按理應該不可能詳細見於官方記錄或文字，可是，由於楊著沒有任何德國資料的印證，很容易讓人產生懷疑。

### 三 國共和談

「國共和談」或「國共合作」一直是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熱門話題。楊天石在三輯《蔣介石日記解讀》中都有或多或少地提及。第三輯的〈蔣介石為何拒絕在《延安協定》上簽字？——羅斯福派赫爾利調停國共關係經過〉一文，篇幅達數萬字，應該是本輯最長的文章。其實有關羅斯福派赫爾利（Patrick J. Hurley）調處國共，在過去已經有很多研究，各方立場也很清楚：赫爾利只是簡單地關注團結抗日的問題，並不了解國共雙方長期爭執所在。國民政府一直是以「軍事國家化」為前提，在意於中共自主的軍隊；但是中共堅持要先「政治民主

楊天石依據新材料來修正自己過去的觀點。在獲得俄國檔案後，他對於蘇聯與中共的態度有了新的看法，從新方向再論「重慶會談」。這些檔案清楚顯示毛澤東非常希望蘇聯能夠給予協助，以及毛旁敲側擊地打探蘇聯的立場。

化」，批評國府不夠民主。筆者認為雙方在協定上各有堅持，這並不關乎蔣是否要在《延安協定》上簽字的問題，也非楊提到的蔣拒簽的三點原因（不願意改變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政治結構、長期懼共與反共的心理、歐洲國家聯共的影響）可以解釋（頁148-51）。

然而，有趣的是，這篇文章透露出中共在談判中的兩面手法，從另一方面說明了蔣介石難以放心接納中共的原因。例如，1945年7月4日，毛澤東在面對訪問延安的參政員時表現出對蔣的尊敬，「毛澤東『從席上十分莊敬地起立』，囑咐褚輔成等歸去後，『務須向蔣委員長多多道謝，給我們難得的機會，有諸位來延安，使我們聽受到許多平時不易聽到的話，增加了不少的了解』。毛澤東並祝蔣委員長健康。」（頁146）但是六天以後，毛為新華社撰寫社論〈評蔣介石參政會演講〉，卻大肆批評參政會與蔣介石。他指責「第四屆國民參政會『以粉飾蔣介石獨裁統治為目的』，指責『帝國主義者』赫爾利為蔣介石『撐腰』，特別指責赫爾利4月2日在華盛頓的演說替『國民大會』等項『臭物』捧場」（頁147）。

同樣地，中共過去至少兩次表示願意將軍隊交給駐華美軍司令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指揮，與國民黨共同抗日，可是，當國民政府在1945年1月提出組織軍隊整編委員會，由美國派一將官任敵後中共軍隊的總司令，以及國民黨、共產黨各派一人任副總司令時，不但遭到周恩來拒絕，毛澤東更直接表示：「這是將中國軍隊尤其將我黨軍隊隸屬於外國，變為殖民地軍隊

的惡毒政策，我們絕對不能同意。」（頁136）這種在短時間內改變態度的情況屢見不鮮，也許對毛或中共而言只是政治手段的運用；但當中共屢屢應用這種兩面手法，就很有可能成為讓蔣介石無法信任中共並與之實現合作的重要原因。其實每一次的「國共和談」或「國共合作」，都有多元的問題存在，不但內部難以整合，在合作的終極目標與進行的策略上，雙方也有極大的差異；再加上歷史的心結所形成的巨大鴻溝，是以無論是抗日的背景所驅使，還是美蘇等國際力量的介入，雙方的合作最後都難以為繼。

楊天石治學態度認真，體現在他不斷發掘新材料，同時又能依據新材料來修正自己過去的觀點。在第一輯中，已收入一篇關於二戰後國共「重慶會談」的文章<sup>⑧</sup>。該文根據蔣日記，描述蔣在重慶談判期間一度有扣押毛澤東並加以審判的念頭，且這念頭一直在其內心掙扎，然而蔣最後決定向毛授勳、禮送毛回延安從而打動他。後來楊獲得韓國學者提供相關俄國檔案後，對於蘇聯與中共兩者的態度有了新的看法，從新方向再論「重慶會談」，寫成第三輯的〈蔣何以邀毛，毛何以應邀？——以美蘇兩強與重慶談判的關係為研究重點〉一文，展現出國共在「重慶會談」中的新內幕。

長期以來對於「重慶會談」，學界多認為由國共雙方自行進行談判，外力介入較少，特別是中共對二戰後的中蘇關係一直諱莫如深，外界一向所知不多。一直到毛澤東的俄文翻譯師哲在1991年出版了《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外界才知道毛在抗戰後接到斯大林

的來電，於是決定前往重慶與國民政府展開談判<sup>⑨</sup>。可是蘇聯兩次來電的全文為何，外界卻不得而知（據接觸過中央檔案館的人表示，這些電報已經找不到）。所以在當時國共談判中蘇聯的態度為何，以及中共如何求助於蘇聯，至今仍是一個謎團。

楊天石所引用的俄國檔案，很清楚顯示毛澤東非常希望蘇聯能夠給予協助，以及毛旁敲側擊地打探蘇聯的立場。首先，毛在1956年告訴蘇聯大使，他當時去重慶是因為蘇聯的「密電中堅持要毛澤東前往重慶同蔣介石談判。中共中央曾經反對前去重慶，因為預料蔣介石方面會進行挑釁。毛澤東說，但是我不得不前往，因為這是斯大林所堅持的主張」（頁173）。楊引述俄國檔案，證明當時莫斯科其實發了三封電報，而其中更明確指出中共路線之錯誤，反對中國再打內戰。電報內容批評之嚴厲，口氣之嚴重，讓中共更改了主戰的念頭（頁170-73）。這一點在戰後國共和談上極具意義，也讓懸疑多年的問題得以水落石出。

其次，在國共談判過程中，中共代表（如周恩來、毛澤東、王若非等）曾多次訪問蘇聯駐華大使館。根據楊天石所引當時蘇聯大使彼得羅夫（A. A. Petrov）的報告，中共代表用各種方式來打探蘇聯對華的態度、就《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內容提出問題，並詢問蘇聯對於國共發生衝突時會採取甚麼態度、一旦美國協助國軍攻擊共軍時蘇聯會如何反應。最令人驚奇的是，彼得羅夫一再規避正面的回覆，只是

多次強調：「蘇聯非常希望看到中國在政治上統一，兩黨的談判應該繼續下去，並通過相互的讓步達成一致意見。」（頁201）可以推測，蘇聯的模糊立場可能就是「重慶會談」能夠順利舉行的原因之一。

不過，楊天石對於「重慶會談」所作的正面結論，或會令讀者感到突兀。他認為這場談判有三個歷史經驗：力爭以文談代替武戰；捐棄前嫌，面向未來；讓步與忍耐，並認為：「總的看來，重慶談判雖不圓滿，但大體成功，這就為召開國、共、其他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政治協商會議打下基礎。」（頁206-207）然而，在第一輯的文章中，楊才討論過蔣介石有扣留審治毛澤東的念頭；而毛回到延安後，在延安幹部會議的報告中也說過：「積十八年之經驗，深知是這麼一回事。國共兩黨一定談判不好，一定要打仗，一定要破裂。」<sup>⑩</sup>這樣看來，楊對於「重慶會談」的評價可能稍微過高了。

#### 四 綜論蔣介石

總的來說，楊天石主要還是以單一事件為焦點撰寫文章，出版的著述也主要是文章的結集，故較少展現他對蔣介石作整體論述的印象。楊本人也提到，不少朋友都鼓勵他早日寫一本蔣介石傳，但是他決定先繼續解讀蔣日記，撰寫專題研究論文，等到專題研究計劃大體完成，才會考慮寫蔣傳的問題（頁IV）。不過，在第三輯的附錄部分收錄了他的一篇演講稿〈蔣介石其

楊天石認為蔣是一個「民族主義者」。在抗戰時期，國民政府非常看重美國的軍事經濟援助，但是當美國的舉措牽涉到國家主權立場或是國家利益時，蔣必定在日記中反覆責備與批評。

作者將主題不同的文章依時間來組合，各編中文章的論述方向未必統合。第四編「退守台灣」特別顯得散亂，文章之間的關連性太少。如果將此書的所有文章依內容分成政治、外交、主權與其他，可能更有助於讀者了解蔣介石及其處理政事之策略。

人——在季我努沙龍的演講〉，可以初步看出楊對蔣評價的大致輪廓。基本上，他認為蔣有七功：反清、反袁、反陳(炯明)護法、黃埔培養軍事幹部、北伐、領導抗日、建設台灣。在這七功之中，他又選出三個大功：北伐、抗日、建設台灣。另一方面，他也提出蔣所犯的三個過錯：清黨剿共、三年內戰、在台灣的白色恐怖(頁427-29)。至於蔣為何丟了大陸？他提出五點原因：丟掉農民；丟掉了民族資產階級；發動內戰，經濟政策失誤；一黨專政，個人獨裁；腐敗(頁430)。雖然楊並沒有細緻地討論這些功過，但大體上，這些觀點都符合近年學術界對蔣的評價。

楊天石的這三輯作品，均顯示出蔣介石內心有很大的自負與自戀。也因為如此，蔣在處理中外關係上特別感到痛苦。如前所述，楊在一些研究個案上，未着重探討蔣處理弱國外交的內心世界，但他是知道這一點的，也在演講中稍微提到蔣之所以在「九一八事變」後對日本採取妥協退讓政策，「根本的原因是敵強我弱，日本是強國，中國當時是弱國。在這個情況底下，蔣介石學習勾踐，這是他文化上心理上的原因」(頁414)。其實蔣對英、對美、對蘇的外交，都有這種忍辱負重的心理——既有求於他們，但又因為他們侵佔中國權益而感到屈辱。筆者認為，這種內心活動，當是日記最能顯示的地方；或許楊將來在寫作蔣傳時，可以利用蔣日記的材料多加着墨。

如同楊天石在第三輯一開始論述抗戰時期的綏遠與新疆的議題所

示，蔣介石雖然要應付強鄰，但是時時以國家主權為念，這也影響到他的外交施政。楊天石認為蔣是一個「民族主義者」(頁417)，是一個相當好的提法。在抗戰時期，國民政府非常看重美國的軍事經濟援助，但是當美國的舉措牽涉到國家主權立場或是國家利益時，蔣必定在日記中反覆責備與批評，如在「史迪威事件」中，最後蔣寧可不要美國援助，也不在意與美鬧翻，還下定決心要美撤換史迪威<sup>①</sup>。後來退居台灣時，即使是蘇聯要幫助蔣介石反攻大陸，蔣還是有民族主義的底線，提醒自己不能當蘇聯傀儡，不能當吳三桂、洪承疇(頁419)。這些都反映了蔣民族主義者的形象。

## 五 整體評論

嚴格來說，第三輯所收的十三篇文章未必都能稱作「專題研究論文」，這是因為文章長短懸殊(從幾千字到幾萬字)，也包括沒有註釋的文章，如〈尼克松競選與蔣介石、宋美齡的晚年感情危機〉；而有文章亦沒有結論，如〈陳潔如回憶錄何以塵封近三十年？〉。至於〈蔣介石與德國內部推翻希特勒的地下運動補述〉以及兩篇附錄，其實是楊天石與汪榮祖筆仗的產物，而引起筆仗的原始文章則收入《找尋真實的蔣介石》第二輯。讀者若不是曾經參閱楊天石的原始文章以及後來汪榮祖的批評，很難單就這三篇補述文字來檢視這場筆仗的全貌，也自然難以評定雙方交鋒的結果。

作者將這些主題不同的文章依時間來組合，所以各編中文章的論述方向未必統合，同一段時間可能會討論不同的主題。其中第四編「退守台灣」特別顯得散亂，所收的四篇文章分別討論釣魚台主權之爭、《陳潔如回憶錄》、蔣介石聯合蘇聯謀劃反攻大陸、尼克松競選與蔣宋感情危機。文章之間的關連性太少，編在一起過於勉強。如果將此書的所有文章依內容分成政治、外交、主權與其他，可能更有助於讀者了解蔣介石及其處理政事之策略。

雖然如前所述，第三輯中的一些文章在史料與觀點上都有重要意義，但是第三、四編所收的文章，創新不多。如關於戰後政協會議功敗垂成、提議胡適競選總統等，過去已有相關論述；孔祥熙的貪污及蔣經國的上海「打虎」亦缺少新意。特別是第四編多為短文，如〈蔣介石與釣魚島的主權爭議〉一文，只能算是學術小品。

至於〈陳潔如回憶錄何以塵封近三十年？〉一文，主要整理國史館與蔣介石檔案的資料，中間引文甚多，以編排史料為主，敘述當時外交部與蔣身邊的官員（陳立夫、俞國華等）如何盡力封殺《陳潔如回憶錄》的出版。不過，從該文所見，楊天石顯然對於美國的新聞媒體不夠了解，如他引用“NANA”的資料，卻在文中表示：「《NANA》，不詳，可能是一種報紙」（頁355），而在四頁之後他卻提到「紐約中文《聯合日報》連續譯載北美報業組合記者的特訊」（頁359）。假如楊稍為措意的話，就會知道“NANA”即是「北美報業組合」（North American Newspaper Alliance，又譯北美報

業聯盟）這個提供新聞稿的通訊社組織的簡稱。

楊天石解讀蔣日記與蔣介石的活動，優點是詳列史料，展現事情的來龍去脈。楊引述蔣本人的說法，配合各種史料，娓娓道來，十分吸引人。但是在呈現歷史時，楊過於注重敘述，似乎認為把事件鋪陳於讀者面前就是完成了史家的工作，缺少對於蔣介石思想的分析。舉例來說，接觸過蔣日記的讀者都會發現，抗戰後期蔣勤讀《明儒學案》與《聖經》，不但日記中時有摘記，而且還對所讀之書加以申論。那麼，蔣當時如此認真所讀與所思考的，是否影響到他的決定與決策？是否在危難之際給他安慰或指引？這一部分是楊在第三輯的文章中解讀蔣的行事為人方面所缺少的。

至於蔣介石的反共，可能有多重因素。但是否如他所言受到基督教的因素影響，筆者對這點還有所保留。楊天石引蔣日記的說法：

他說基督教講博愛救世，基督教的思想核心是「愛人」，共產黨搞階級鬥爭是主張「恨人」。一個「愛人」，一個「恨人」，蔣介石說，我還是選擇「愛人」吧！選擇「愛人」就選擇了基督教。這是蔣介石最後離開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原因。（頁423）

但是蔣早在接觸基督教之前，就已經因為訪問蘇聯、中山艦事件、清黨等事，與蘇聯和中共漸行漸遠。可以確定的是，基督教真正對蔣的行事為人產生影響，其實發生甚晚<sup>②</sup>。因此，楊以蔣日後提到因基督教而放棄共產主義作為其反共原因，似乎還有討論的空間。

蔣早在接觸基督教之前，就已經因為訪問蘇聯、中山艦事件、清黨等事，與蘇聯和中共漸行漸遠。基督教真正對蔣的行事為人產生影響，其實發生甚晚。因此，楊以蔣日後提到因基督教而放棄共產主義作為其反共原因，似乎還有討論的空間。

楊天石曾經直言蔣日記是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學者不可不讀、不可不用之書。乍看之下，或會以為他過於着迷蔣日記的內容，其實他對此日記有持平之論：「如果研究近代史不看蔣的日記是很大的損失，但是看了甚麼都相信，也會上當。」

最後需要補充的是，內地出版楊天石的著作，多少還是做了點「把關」的動作。如在《找尋真實的蔣介石》第一輯，內地版所收文章要比香港版少一篇，附錄的〈蔣介石與中國抗戰——在中國現代文學館的演講〉被刪除；而在《找尋真實的蔣介石：還原13個歷史真相》（相當於香港版第三輯）的〈蔣介石收復新疆主權的努力〉一文中，有關「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的部分則有數段被刪，明顯是基於內地編者的政治忌諱<sup>⑬</sup>。

## 六 結語

開風氣之先者，自然經歷過備受攻擊與批評的階段。就評價蔣介石這個議題，即使是如楊天石這樣知名的學者，其論著又有大批的史料佐證，在中國大陸還是偶有異議之聲，從匿名檢舉到要求嚴肅調查，從「歷史虛無主義」到「離開了階級分析方法」，可以說是批評不斷<sup>⑭</sup>。而楊天石也回文應戰，他往往引中共中央政策，或是藉高層領導之言以護身，為連連筆仗文章添加許多趣味。當然，討論、引用或讚譽楊天石的作品遠比批評的更多，這是應該要先說明的。

前文已提及，此書包含長短不一的論文、書序、演講稿，沒有註釋或沒有結論的文章，以及幾篇與汪榮祖筆仗的文章，同時這是楊天石系列解讀蔣日記的第三輯，所以單單以這一輯來評斷楊的學術貢獻，或是將此書置於有關蔣介石研究的國際文獻基礎上來討論，對作者是不公平的。楊的系列著作不過

是在為他將來撰寫蔣介石傳作準備，其中也有不少是應時的文章（如書序、演講、筆仗文章等），難免顯得零散。寄望楊天石早日撰寫蔣傳，對中國近代史研究作出更大貢獻。

楊天石對蔣日記深下功夫，也力倡其重要性，曾經直言「這部日記保存着大量信息，是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學者不可不讀、不可不用之書」（頁VII）。乍看之下，或會以為他過於着迷蔣日記的內容，其實他對此日記有持平之論。如他在演講中說道：「我研究蔣介石，得出這麼兩個結論，如果研究近代史不看蔣的日記是很大的損失，但是看了甚麼都相信，也會上當。」（頁413）他特別提到：

蔣介石並非甚麼都記……其所記，也並非都可靠，正確，其中謬誤和反映蔣介石的個人偏見之處所在都有。……迷信日記、專憑日記立論不行，只有傻瓜、笨蛋才這麼做、必須廣泛收羅各種相關文獻加以考核、參證、補充，才有可能讀懂日記，進而讀懂蔣介石其人及其時代。（頁VII）

這種研究精神才是楊天石的本衷。外界對於楊的批評多未能到位，有些是根本不相信蔣日記，有些是基於政治立場。時間是檢驗歷史著作的最好方式，相信現在的紛紛擾擾遲早都會過去，終歸要回到歷史的真正內涵。

楊天石在公開演講中，提到中國大陸「過去的歷史講到國民黨，講到蔣介石時，應該承認是講了不少謊話，不少違背歷史真實的話」

(頁407)。他自然知道講這些話會給自己帶來很多麻煩，但還是願意做一個講真話的先行者。學者要秉持這樣的精神做研究，才會產生令人欽佩的作品。

### 註釋

① 楊天石著作甚多，近年以公布檔案為主的著作，參見楊天石：《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蔣介石與南京國民政府》（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追尋歷史的印迹：楊天石解讀海外秘檔》（重慶：重慶出版社，2016）。

② 筆者於2008至2009年獲胡佛研究所聘任，曾在此客座一年。其時楊天石正在閱讀該所剛新開放的一批蔣日記（蔣日記是分期逐步開放的），對於他勤讀史料的認真態度留下深刻印象。

③ 參見楊天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香港：三聯書店，2008）；《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二）》（香港：三聯書店，2010）；《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三）》（香港：三聯書店，2014）。

④ 一般來說，中國大陸學術界在1978年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比較能擺脫思想束縛，故1980年代以來對國民政府在抗日戰爭中的作用開始有較公允的評斷，也擴大對抗日戰爭正面戰場的研討。參見曾景忠：〈中國抗日戰爭正面戰場研究述評〉，《抗日戰爭研究》，1999年第3期，頁77-101。

⑤ 參見邵玉銘：〈宗教決定政治：探討先總統蔣公對於抗戰勝利後接受東北之決策〉，載王成勉主編：《補上一頁欠缺的歷史——蔣介石夫婦的基督教信仰》（台北：基督教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2013），頁14-24。

⑥ 楊天石：〈蔣介石與德國內部推翻希特勒的地下運動——迄今不為人知的二戰機密之二〉，載《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二）》，頁152-67。

⑦ 汪榮祖：〈蔣介石策動德軍推翻希特勒質疑〉，《傳記文學》，第96卷第4期（2010年4月），頁128-35。

⑧ 楊天石：〈如何對待毛澤東：扣留「審治」，還是「授勳」禮送？——重慶談判期間蔣介石的心態考察〉，載《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頁419-41。

⑨ 師哲回憶，李海文整理：《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修訂本（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308。

⑩ 毛澤東：〈關於重慶談判〉，載《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頁1055。

⑪ 例如在與美方爭議史迪威調職時，蔣以電報通知當時在美的孔祥熙：「勿在美國要求任何接濟，並令作速返國以示決心。」梁敬錚：《史迪威事件》（台北：商務印書館，1975），頁335。

⑫ 關於蔣氏夫婦的基督教信仰，參見《補上一頁欠缺的歷史》。

⑬ 參見楊天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找尋真實的蔣介石：還原13個歷史真相》（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

⑭ 關於批評楊天石評價蔣介石者，最有名的當是北京大學前副校長梁柱，他們彼此論戰的文章，參見〈楊天石、梁柱刊文爭鳴：如何評價蔣介石〉，《中國社會科學報》，第671期（2014年11月24日），近代中國研究網，<http://jds.cass.cn/Item/28427.aspx>。

王成勉 國立中央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特聘教授